

明清易代史獨見

常任俠題



陈生玺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明清易代史独见

陈生玺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该书运用丰富而坚实的历史资料，通过科学的考证，对明清易代之际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不少新见，诸如明清之间的和战问题，李自成进北京后，吴三桂为什么由抗清到引清兵入关，陈圆圆的家世出身、被劫遭遇、与刘宗敏、吴三桂等人的关系、最后的归宿以及清初的剃发等问题，作者摈弃传统俗见，立论新颖，对明清历史和文学研究者，本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 清 易 代 史 独 见

陈 生 玺 著

责任编辑 贾传荣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鑫荣科技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0 千字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48-0439-6/K·99 定价: 7.50 元

序言

这本小册子，是我近十年来对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史事论述的结集。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我来说，却是几经挫折之后一个迟到的春天，来之不易。早年虽有志于研究明清历史，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迫害，未能如愿以偿，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将近知命之年，才在师友的帮助之下归队，获得了重新学习和研究的机会。所以我这十年，实际上只是研究历史开始的十年。多年来深藏心底的一些思想能够此间得以表述，较好的环境使我能够按照科学的原则，进行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些历史问题。这些问题，于我都是难啃的硬果。十年啃硬果，惟敢啃而已，是否啃动，尚不敢自是；不过，在力求探索历史真象中，却可看出我对明、清易代之际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某些理解。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王朝更替频仍，其间历史影响较大的王朝，诸如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都是经过了一次社会大动荡之后而建立的。在每一次大动荡的政治较量中，多是群雄并起，割据争锋，各自都想打败自己的竞争对手而归于统一，南面独尊。但最后的胜利者并不都是那些兵多将广势力最强大的执牛耳者，却往往是异军突起，后来者居上；他们最初鲜为人所注意，其后逐渐发展壮大，终于削平群雄，创建了新的王朝。新朝之所以能够建立，是由于它的创业者在与群雄的相互较量中实施了许多优于他人和适于时代需要的政治和策略。从这一点讲，历史在无声地实行着优胜劣败的原则，优者胜利成功，劣者失败而被淘汰。虽不排除

有侥幸的胜利者，但它不是短命的，就是苟且偷生而毫无作为者。所以在每一次社会大动荡之后建立的新王朝，大都有若干不同于旧王朝的措施和气象，并非仍然率由旧章，依样画葫芦。

明、清之际，是我国古代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更迭时期，同样也经过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其特点是在这次社会动荡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即李自成的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明王朝，进入北京之后仅四十余日，却突然被吴三桂引导入关的清军所击败，取而代之。所以这一阶段的历史很早即为史学界所重视，自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来，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极为热烈，争论的焦点是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何以清军却入关统一了中国？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吴三桂何以要请清兵？郭沫若的意见是李自成进北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迅速腐化，不听从李岩的正确意见；刘宗敏抢劫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导致吴三桂去请清兵，即吴梅村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史学界一些人套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农民反抗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而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不是被地主阶级所镇压，就是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而蜕化变质，最终归于失败，不可能成功。根据这种理论，便把历史上一切治乱因革和王朝的更替，都简单的归结为一个统治阶级代替另一个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反复循环而前后没有什么质的不同。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则认为李自成推翻了明朝，这是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为什么又失败了呢，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刻骨仇恨，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联合了满洲贵族，镇压了农民起义。姚雪垠先生为了论证农民军的伟大进步

作用，在撰文批评郭沫若时，连明末确有一个妓女陈圆圆也不愿意承认，说她很早就死了，根本与农民军没有发生任何关系，说刘宗敏曾经抢夺陈圆圆这种说法，是来自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诬蔑。有的学者为了肯定李自成和谴责地主阶级，说农民军中根本没有一个李岩，一切有关李岩的记载，也是地主阶级编造出来用以诬蔑李自成的。如此等等。

上述这种观点，乃是根据哲学上的一对矛盾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由一对矛盾中的两个方面的相互斗争来决定的。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明朝统治者为一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为一方，这一对矛盾的相互斗争决定当时的历史发展。明朝之所以被推翻，是由于它的腐朽与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李自成在推翻明王朝之后的失败，乃是因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根据这种观点，自然就把在关外已经建国二十八年（1616—1944）的清王朝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了。近几年来，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则与上述观点不同。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我认为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对矛盾斗争决定历史的命运，亦不是以明朝为一方，而李自成为另一方的两种力量进行斗争；而是三种力量：明王朝、关外的清兵、李自成的农民军之间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最后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李自成的失败、清王朝的胜利这种结局。尽管是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但明廷并不仅仅败于农民军，在此以前，它已多次败于清军了。从这种格局出发来解释明清易代之际，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李自成迅速败亡这一重大戏剧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不是一种偶然的了。同时，也不至于沿袭旧的窠臼，把一切的历史罪责都推在吴三桂一个人身上。因此，我对清兵为什么入关、吴三桂何以降清、李自成为什么失败，提出了一些看法，并对当时一些有关的人和事如陈圆圆的家世、

出身及其归宿，李岩在北京活动的历史事实，清兵入关初期实行的剃发令等问题，进行了一些考察。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我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从事实出发，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搞清楚，这一问题的核心与关键点搞清楚，微观上要深入，宏观上要全面，只有把问题搞清楚了，才能阐明它的意义。对同一事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绝不能因此而改变事实本身。所以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好恶和时代需要来塑造历史，进行取舍，既不能为尊者讳，有意护短；亦不能恶归下流，把脏水往一个人身上泼。而应当把当时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较量的各种力量，放在同一的历史天平上进行衡量，评比他们的优劣和是非。

研究中国历史还必须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代的王朝更替和社会大动荡中，少数民族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某种活动，他们很少置身于事外。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首先向明朝发难的就是清王朝的创始者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在明清之间的战争进行了十年（1619—1629）之后，才爆发了农民起义，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才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在农民军力量壮大之后，尽管明朝内部有人主张先安内而后攘外，先与清朝议和，以便用全力平定农民起义，但明王朝却始终把主要的军事力量放在对付关外的清兵上，直到李自成进军北京，明朝即将灭亡时为止。所以明清之间的战争直接影响明王朝和农民军两个方面的历史命运。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向有不同意见，人们习惯于用结果去说明原因，因为后来清朝统一了中国，所以许多学者便认为清对明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有取明而代之并要求统一的意图，清朝提议与明议和完全是一种斗争策略。对此，我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与他们

完全不同的见解，阐述了清朝为什么愿意与明议和的战略目的，以及明清议和失败的原因，揭示了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双方夹击下决择上的一次重大失误，丧失了获得喘息和扭转局势的机会，从而导致了后来的严重后果，此实明清存亡之大机。

在明清之际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也常常为史学家所忽略；即蒙古问题。蒙古本来是明王朝北方的屏障，是明朝用以牵制满族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明清双方发生对抗之后，于中原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的同时，在塞外大草原也发生了一场大的动荡，先是蒙古各部纷争，继则是满蒙之间的激烈战争，这场战争席卷了整个蒙古草原，导致了漠南蒙古为清朝的皇太极所征服，统一的蒙古从此分裂，这大大增强了清朝方面的实力，使它有力量屡次打败明军，最后乘机率兵入关定鼎中原。这一格局的变化，不仅加速明朝的灭亡，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北部的形势，造成亚洲北部民族关系的新变化，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极大。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但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根据对以上所述诸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明清之际既是一个农民大起义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的剧烈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斗争和互相融和的大变革时代。在这两种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李自成并不是败于明朝地主阶级的反攻和倒算，而是败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皇太极和多尔衮，这才使清朝代明而统一了中国。明清史的先辈学者郑天挺先生曾说：“关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非汉族政权，辽、金、元都是非汉族政权，清军入关是非汉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再度出场。”（《清史简述》）可见，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活动和地位也日益重要。那种说民族斗争实质上是

阶级斗争的理论，实际是取消民族问题在历史上的独立地位，阶级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实体，是不能互相代替和随意取消的。只讲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而不讲民族之间的纠纷和战争，既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况，也不能反映中国历史的全貌。

明清易代之际的问题本来很多，我只是就目前史学界有争论和人们较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当然，这些探讨也只是学海一勺，管窥蠡测之失，在所难免。为了投石问路，惟公诸同好，方能聆听方家之教言，恳盼时贤不吝赐教。

拙稿编就后曾就教于好友杨成孚教授，承蒙不弃，多所指正之后，谬加推许，并云：“映乾兄，你虽未垂询大作书名，我看可名曰《明清易代史独见》。”盛情难却，受之而思本书之名义，所谓独见者，一己之见、一家之私言、一得之愚也。书中偶与前贤所见相同者并非苟同，而大异者亦非矜奇立异，均为笔者经过一番苦心研究之独立见解。文后附录《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略述郑天挺先生的教席生涯和学术思想，以志从学始末。并录《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一文之英译，亦备不谙汉文之外国学者参阅。

著者

1990年1月于天津

目 录

序 言

- 一、论明清松锦之战与洪承畴援辽的失败 1
- 二、松锦之战后明清议和始末 32
- 三、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之真相 56
- 四、陈圆圆其人其事考 89
- 五、刘宗敏·吴三桂·陈圆圆 107
- 六、李岩在北京史事新考 117
- 七、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 141
- 八、剃发令在江南地区的暴行与人民的反抗斗争 161
- 九、明末蒙古各部的纷争与清（后金）
 对漠南蒙古的征服 192
- 十、关于毛文龙之死 210

附 录:

- 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郑天挺先生在南开教席述略 226
- 二、The Found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Wu Sangui's Capitulation 247

123119

一、论明清松锦之战 与洪承畴援辽的失败

在清王朝兴起和人据中原的过程中，有三次重大战役，第一次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战，第二次是1641年（崇祯十四年）的松锦之战，第三次是1644年（清顺治元年）的山海关之战。萨尔浒之战后金汗努尔哈赤打败了明辽东经略杨镐四路大军的进攻，随后进入辽东，改变了整个东北的形势，在明清之际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清胜明衰之始。松锦之役，清太宗皇太极击溃了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十余万援辽之师，夺取了关外的军事重镇锦州，使明王朝长期经营的宁锦防线被突破，护卫北京的关宁旅和边兵丧失几尽，为1644年的山海关之战进入中原扫清了道路。但这场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皇太极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何在？是否就是为了夺取中原进而统一全中国？在这次战役中清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明军遭到惨败，原因在哪里？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正确认识明清之间斗争的特点与明清之际历史发展的趋势。

一、明清双方对锦、宁地区的长期 争夺与松锦之战的发生

从努尔哈赤进占辽沈以后，明清双方的军事斗争中心先集中于辽西的广宁一线。后集中于对锦州、宁远的争夺。天启元年（1621）明辽东经略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山海关一线为防守重点，正面对敌；天津、登（州）莱（州）水师为偏师，进行策应。由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轻敌主进，经、抚

不和，导致天启二年（1622）的广宁之败，明军退至山海关，清军追至塔山不及而还。清军便将广宁、锦州、右屯卫明军的积储全部运往辽东，将辽河以西的人民迁往河东。次年又将广宁、义州城拆毁，军队全部撤回，辽西便被弃为瓯脱。清军自己无力防守，也不许明军进驻。因为这一地带是辽东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其他西北依山，东南面海，为一狭长走廊，无论是清军要继续南下进攻明朝，或是明朝要逐步北上恢复辽东，都必须由此通过。故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明军在广宁失败之初，兵部尚书王在晋主张划关而守，下令将山海关外宁远、前屯卫等处的一切守备全部撤回，以免遭到清军的袭击。宁前兵备道袁崇焕根据自己对辽东地形的实地勘察，则主张坚守宁远，为守护山海关和逐步恢复辽东之根本。袁崇焕这一主张受到枢辅孙承宗的支持，于是决定在宁远筑城。天启三年（1623）九月始筑，四年城成。至天启五年（1625）明军以宁远为基地，渐次向东恢复了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卫、大小凌河诸城。但孙承宗和袁崇焕这一措施的重要意义并没有为明王朝更多的人所认识。十月孙承宗被宦官魏忠贤排挤去职，派高第任辽东经略。高又主张弃关外不守，下令撤除锦、右、大小凌河、松、杏、塔山诸城守具，尽驱兵士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石。在撤除宁远、前屯卫时，袁崇焕坚决反对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①所以宁远坚守未撤。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认为明经略易人，正是进军的大好机会，便率军五万号称二十万来攻宁远，^②下书要袁崇焕投降说：“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

①《明史》列传147，“袁崇焕”。

②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即封以高爵。”袁崇焕则答以：“宁、锦二地乃汗所弃之地，吾修治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①于是清军猛烈攻城，数日未下，时地冻天寒，以战车覆城下，用斧凿城，城已穿而不坠，被袁崇焕用西洋大炮和药罐雷石打得大败，损兵折将而回。努尔哈赤很灰心丧气地说：“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怪累日。^②

这是明清第一次对宁远的争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据有宁远对自己的重要战略意义。清军失败以后，秀才刘学成即上书努尔哈赤，建议不要因这次攻宁远未下而灰心，“视宁远为无用之处，今若不收，恐过时机”，下次攻取后必须留兵驻守，然后可攻取山海关，直至都城。^③不久，努尔哈赤发病而死。

明朝方面在宁远之战以后，任袁崇焕为辽东巡抚，袁提出了“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④的复辽战略。利用努尔哈赤之死的机会，派人前去吊丧，以议款名义刺探清方军情，新继承汗位的皇太极为了东征朝鲜，也与明朝虚与委蛇，遣使相报。天启七年（1627）三月，朝鲜受到侵略后向明紧急求救，有的朝臣便弹劾袁崇焕与清讲款，贻误属国。但袁崇焕却力排众议，提出应乘清军东出的机会，赶快派人修筑锦州、塔山、大凌河三城，“令彼掩耳不及，待其惊觉而我险已成”，“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⑤因这是关系到北京的安危和复辽的大计，便派班军四万前去筑城，昼夜不息。不久皇太极得知明军筑城后停止遣

①《满洲实录》卷8。

②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四。

③《故宫周刊》合订本第13册：《汉译满文老档拾零》。

④《明熹宗天启实录》卷19。

⑤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

使，并指责袁崇焕假意议和而乘机修城是一种阴谋。四月十八日清军从朝鲜大胜而回，五月三日皇太极即亲率大军气势汹汹直奔锦州而来。大凌河城还未修好，明军主动弃城而逃，锦州城尚未完工，即于十一日被清军包围，清方下书要城中投降说：“此我家地方，尔等在此修城何为！”明军守将答以“城可攻不可说也”。^①皇太极本来以为乘东征朝鲜的胜利，对锦州可一鼓而下，结果于十二日攻城中被明军打得大败，退兵五里而营，十四日急忙派人回沈阳增调援兵，二十五日援兵到来，时明大军集于宁远，清军于二十八日围攻宁远，结果仍被明军打败，皇太极气急败坏地说：“昔皇考取宁远不克，我今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能张我国威耶？”^②下令军队再攻，结果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与瓦克达俱受伤。二十九日便从宁远退军，六月初四日再攻锦州，亦未攻下，连夜退兵东返。沿途将明军修筑未完之大凌河小凌河城尽行拆毁。此役明人称曰宁锦大捷。明军在辽东的防线由宁远向前推移到了锦州。从此明清之间进入了锦宁军事相峙阶段。

这是明清第二次对锦宁的争夺。由于清军连续两次失败，皇太极便改变了对明斗争的策略，崇祯二年（1629）十月，利用喀喇沁蒙古作为向导，从蓟镇之长城边口突入内地，直逼北京，但由于山海关锦宁一线在明军手中，堵住了清军的后路，虽然一度攻占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但最后还是失败而回。另一方面就是积极倡导与明议和，他想若能利用议和的手段，使明王朝承认清据有辽东的合法权，愿奉明正

①《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锦宁战守”。

②《清太宗实录》卷3。

朔，明朝皇帝“制印给用”。^①于是到处投书，申明自己起兵之由是因七大恨所致，并无取天下得大位的野心。所以，锦宁两城在当时对明清双方都是存亡攸关之所在。明朝坚守它，就能阻挡清军的继续南进，并可进而恢复辽东，皇太极不能控制它，辽东就没有安全感。此明清斗争之一大关键。

崇祯四年（1631），明军将清军逐出长城收复了遵永四城之后，便决定进一步恢复广宁、义州、右屯卫三城，先派祖大寿率兵万人护班军修筑大凌河城，昼夜不停。皇太极得到这个消息后，急诏归附蒙古各部出兵从征，亲率大军前往大凌河时谕诸将说：“沈阳辽东之地，原非我有，乃天所赐也，今不事征讨，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筑城廓，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②可见他对明军在锦宁向前推进的军事行动非常敏感。他认识到明军若在大凌河站住脚，不久将进据广宁、义州，兵锋直指辽沈。所以他率军昼夜兼程，将大凌河围住。这次清军围城后，明朝援军总兵吴襄和宋伟屡易师期，被清军击败于距大凌河十五里之长山，祖大寿在大凌河孤城困守三月后投降。投降时答应回锦州为清赚取城池，但他去后复为明守，清军便毁大凌河而返。通过大凌河之役清军制止了明军继续向前推进的势头，但锦宁仍然坚如磐石。此后，皇太极便暂时把斗争中心转向了征服蒙古察哈尔和内部的改革。

崇祯五年（1632）皇太极率大军征察哈尔，林丹汗远遁。崇祯七年（1634）西收察哈尔余部，抚明边宣（府）大（同）。崇祯八年（1635）派多尔袞西渡黄河收林丹汗之子额哲，全部征服了漠南蒙古。崇祯九年（1636）改国号后金为大

①《东华录》天聪四。

②《清太宗实录》卷9

清，去汗称帝。十年（1637）东征朝鲜。至此，清王朝已统一东北全境，全无后顾之忧。十一年（1638，戊寅）十月决定对明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即所谓戊寅之役。派多尔衮、岳托率军由长城口深入内地，他自己则亲率济尔哈朗、多铎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等汉军，企图乘明锦宁军队入援内地之机直攻山海关。结果多铎兵至中后所即为祖大寿所击败，清军仅掠牛羊财物而还。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入边清军出口时，皇太极又决定乘机进军锦宁，吸取上次冒进失败的经验，率代善、阿济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汉军运载很多红夷大炮，先集中力量围攻松山，因为松山为锦州护卫，若攻下松山，锦州便无外援，用二十七位红夷大炮四面环攻，火药弹子都已用尽，仍然没能攻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投降后急于为清立功，建议分三路穿地穴攻城，前后二十余日亦未攻下，清军被迫退军。入边清军虽然在内地攻城略地，掳掠了大量的人口和财物，但右翼将领岳托与马瞻死于山东，对清军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皇太极和代善垂头丧气地回到沈阳，为了推卸两次出兵锦宁失败的责任，处分了多铎，降其王爵，夺十六牛录属人，①革石廷柱、马光远汉军固山额真职。这是清军第四次在攻取锦宁的失败。这时明王朝虽已被清军几次深入内地的严重破坏和遍地农民起义烽火弄得千疮百孔，但在山海关锦宁一线仍然保有相当强的军事威势。

皇太极对付明朝的办法，下书议和而明廷不应，屡攻锦宁而未得，几次深入内地而不能得明尺寸土地，下一步怎么办？针对这种情况，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清都察院参政降

①《清太宗实录》卷47。

将张存仁、祖可法等向皇太极陈奏了一篇治国进取大计：“治理如何而安宁，进取如何而万全，讲和如何而成就”三件大事：

一、关于治理之要。他说“今我国铁骑如云，加以蒙古军士，即取天下亦有余力”，必须乘此机会，进取中原，统治才能安定，不要怕明朝地大人多，言语风俗与清不同，难于统治。实际上中原很好统治，只要“慎选宽廉官长，严定惊扰刑律，”施行仁政，就行了。

二、关于进取之计，有三策，上策是刺心之术，派兵“直捣燕京，割据河北”。燕京是明朝的首都，内多客居之人，断通津粮运和西山煤路，必不能守。中策是断喉之术，山海关是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直取山海关，则关外等城陷于绝地，可垂手而得。下策是剪枝之术，屯兵广宁，“逼临宁锦门户，使彼耕种自废”，逐步夺取锦宁，把明兵赶回山海关去。

三、关于议和之策。他说：“我国屡遣人致书欲与议和”，“而明国莫之应”，议和很难成功。而且议和对明有利而对清不利，明朝可借议和之机，召募训练，巩固防御，而清则会因议和而懈怠斗志，安而忘危。“若皇上别有奇虑，务期讲和”，必须先破山海关，使北京陷于孤危状态，和议才可望成功。^①

张存仁、祖可法的这一建议，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当时一些降清汉官们的意见，对清王朝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战略规划。汉官们多从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出发，认为清若立国辽东一隅，终非王者之策；从他们的亲身经历认识到明朝的腐朽与必然灭亡的命运，此时清正可取而代之；另外他们这些人又大多是明王朝的背叛者与变节者，改事新主后不再希望明王朝能够取胜，相反却急切地盼望着清兵早日入据中原，便于他

^①《清太宗实录》卷50。